

风 雨 故 旧 录

许 觉 民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前记

这本集子缘于一位友人的启发。大约是几年前吧，《南方日报》的陈志红女士与我通电话，她知道我曾在出版界工作过许多年，认识不少作家。她说，不妨可以写一点对他们的印象，不必求全，有一点独特的感受便好。这类文章，不论是报社或读者都会喜欢看的。我说等我想好后试试看。不久就写成几篇寄去，志红女士特意辟一专栏，名为“风雨故人”，我觉得很切合，亏她想出来，她还加上了编者按语，我感到相当郑重，我很感谢她。接着就写了大约有七八篇文章陆续刊出。但报纸的副刊每周只有两版，有时因稿挤，我的文章难以做到迅速刊出，在志红那里自然是尽力的。我觉得似乎慢了些，本想一年内写完，看样子不大可能了。

一次沈建中兄来京，谈及此事，他建议可以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上分登一点。之后《文汇报》余之兄来电话，正式约我写这一专栏。为集中起见，经与志红相商并经她同意，我将《南方日报》的版面移到了《文汇报》，那是 1995 年 10 月的事，此后两年中未停止过。今冬建中兄又来电话，他建议汇集成书。我经他这么一说，也同意了。

这本集子的大部分篇幅在《文汇报》刊出时，编辑部把专栏命名为“文坛交友录”，虽很宽泛，不过我总觉得似有

些不妥,所写人物,有的是同辈朋友,而一大半都是我的前辈,写前辈当然也可称为交友,但未免有些自大或不自量之嫌。倘有人对此指责,我自然是应该领受的。

听到有位朋友说,我写的那些人物是大家想要了解的,可惜写得太短了,恰似戏台上的人物,刚上场唱了几句就过去了,因此形象就不算丰满。此语甚是。不过我写时只注意顾及报纸的有限篇幅,大致只以 ~~四五百~~ 字为限,写多了会使编辑为难。当然我的主见还不止此。首先,我也写不出我所知的人物的全貌;再则别人写过的,或早为读者所熟知的内容,重复既无意思,掠美更不容许,所以我只能从我与所写人物间的一些独立的交往着笔,或一件小事,或一个印象,甚至一刹那间还值得记叙的际遇,只要这一“摄取”来自我与人物的独立接触并鲜为他人所知,这就构成了我的 ~~四五百~~ 字的内容了。自然,我这样写只能勾勒出一鳞半爪的粗线条来,这线条倘能显示出些许人物的气质,我以为就不算是白费力气的事了。

至于所写那些人物的遭际,大抵都与“文革”有瓜葛,因此文章就难免坠入悲怆与痛楚的情境里去。“四人帮”是造成悲情的唯一根源,而“四人帮”之覆灭又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尽管那些受难者受尽折磨,他们坚强的意志从未消弭,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志愿永不会变更。到四凶就缚和改革开放的号角响起,他们中的幸存者又无不重新活跃和战斗在文化岗位上,他们的战绩,为新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增添了辉煌的篇章。

这本集子中还收入了我近年来的随笔以及对往事的若干记述。零星而芜杂,并不能写出我以往经历的脉络,只不过是想到什么,就兴之所至地写一点记下来,姑且作为各个时期的生活剪影吧。述及陈寅恪和廖沫沙等的文字,

是我读了有关的著述后写的一些感想。对于这些前辈我无缘与之相识，而他们的坎坷经历一直使我追念于心，既然写的都属于文人有厄之故实，我也就毫不犹豫地将其收入于本书内了。我的一些不顺心的经历，常盘踞在心中，难以摆脱，尤其到了老年，想得愈久，愈是想倾诉。这时只得拿起笔来写，所写的话，无非是向自己说的。有时，我觉得自己很像契诃夫的一篇小说中说一个马车夫老头，他的儿子死了，他痛苦万状，他向人诉说没有人要听，最后只得向那匹马去诉说。我写我的往事，初始的目的也只是写出来给自己看看，算是倾泻胸中的一团块垒。可朋友们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实录，对后人或有警策作用，便也收在这一集子中了。

本书出版时，已时届世纪之交替。我认为 20 世纪是漫长的，也是短暂的。我之感到漫长，大约是我曾经有一日三餐不继的生活，但贫苦并不能使我沮丧，而对于一起与我受苦的母亲和姊姊，她们的不幸和死亡，实在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创痛。至于在十年浩劫中我经历的非人生活更不用说了。在正常的年代，这样的事情都不会有的，尼采曾说过这样的话：“使人们对受苦真正感到愤怒的，不是受苦本身，而是在于没有意义的受苦。”我慢慢懂得了这句话，我的痛苦有些正是没有意义的受苦。

我之感到世纪的短暂，是因为当我对一生的种种有所感悟时，倏忽间已垂垂老矣，譬如旅人，行程已去十之八九，时光却已坠入了昏夜，这就不免使人悲怆。不过我想，生命虽有限，倘能在一息尚存时仍不尽地追求，似乎仍能体会到人生的快意。

一本小书无法容纳很多的事，它的容量，也只是世纪沧海中的一粟，既是一粟，便有它自身的色调，我于是不揣

谦陋地将其付梓印行。

最后我想说 ,我在上海曾生活和工作过 20年 ,对上海有着十分亲切的感情。此次这本小书的出版又适在上海 ,尤使我欣喜万分。

最使我感动的 ,是这本书交由沈建中兄来编就 ,我甚为放心。他是位很有成就的青年 ,我因远在北京 ,无法编书看校 ,他自告奋勇地为我操作 ,设计版面 ,找寻图像资料 ,编定全书格局。这是件十分琐碎而吃力的事 ,为此占据了他大量的业余时间。我说什么好呢 ,道谢一声是不够的 ,我把这件事看作我和他谊情深长的象征。

目录

上编

记圣陶先生数事	猿
宁静的俞平伯	苑
黎澍十年祭	员
君子陈翰伯	缘
郑振铎先生的书之缘	愿
姜椿芳的生命之最	圆
遥祭马宗融	缘
绀弩大兄	愿
九月念傅雷	猿
雪峰的遗憾	猿
萧军风貌	猿
忆陈企霞	源
巴金的深情	源
漫说荒煤	愿
冯牧好客	缘
艾青与爱情	缘
何其芳之言与不言	愿
诗人李季	圆

郭小川在干校.....	远缘
书生吕荧.....	远愿
孟超纪事.....	远园
巴人之死.....	远苑
追忆荃麟.....	远怨
王瑶的烟斗.....	愿袁
沙汀的忧闷.....	愿远
笔耕不辍的艾芜.....	怨园
秦牧的文与心.....	怨源
与钟老聊个没完.....	怨愿
适夷老人	远园
送冰心老人远行	远缘
叶君健写真	远苑
记韦君宜	远员
戈宝权纪事	远远
唐弢的心愿	远怨
吴有恒素描	远园
心曲万千忆周扬	远远
告别萧乾	远苑
潇洒淡远唯启功	远怨
忆曹辛之	远园
二唐记略	远源
纵谈严文井	远愿
感觉张光年	远园

下编

老人访老	远怨
------------	----

世纪忆语	员远
孤岛前后上海书界散记	员猿
夜未央,更著风和雨.....	员猿
——解放前上海生活书店的活动纪实	
回忆中的一点人和事	圆缘
四十年话旧说新	圆园
想起了名编辑	圆猿
毋忘我	圆远
深秋的北风	圆愿
雪	圆员
儿时难再	圆猿
昨夜雷雨	圆苑
黄河口抒情	圆怨
砖塔胡同	圆猿
小楼梦回	圆缘
锅友	圆园
隐友	圆缘
澡友	圆愿
干校记什	圆猿
关于在康乐园的三次会晤	圆缘
读廖沫沙《瓮中杂俎》	圆员
读巴金的《样板戏》	圆远
读王元化一文的随想	猿圆
谁云桑榆孤寂	猿远
韦君宜的《思痛录》	猿员
趣说《百年国土》	猿源
阅《世纪肖像》感言	猿苑

上 编

风
雨
故
旧
录

记圣陶先生数事

我与圣陶先生的交往，虽不算密，除“文革”数年后，也曾未曾间断过，自缘年代起，断断续续也有数十年了。我在少年时读过他与夏丏尊合写的《文心》，一本语文知识与文学故事熔于一炉的少年读物，讲论叙事，十分感人，给我的印象和教益至深。我一直认为这是本中学课余的好读物，以后总未见再印过，殊觉惋惜。从那时起，我对圣陶先生就有一种晚辈对一位学养有素的长辈的崇敬心情。到我年长时，这心情更有了一次飞跃，那是在1957年的春天罢，我参加了一次“反内战”的集会，在上海复兴中路的一个戏院内。会上有周恩来、郭沫若的慷慨陈辞，还有几位的发言已记不清了。而圣陶先生也是发言者中的一位，他说的话我依稀还记得，大意是告知人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意思很明白，当前国事日非，为了正义，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是人所最应有所为之事。我听后惊喜异常，在那时狐兔满路、特务横行的日子里，一位教育家、文学家敢于走在斗争的前列，敢于在这样的场合登高而呼，非有高度觉醒和大无畏的胆识是不为此的。为时不久，李公朴与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暗杀，我又看到了圣陶先生满纸悲愤的文章，题目是《多说没有用，只说几句》，文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今天，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呼号的人士，也没有一个

怕死的。”一段文字，掷地有声。后来，进步刊物《周报》与《民主》相继被国民党勒令停刊，我又看到他的抗议文章《什么道理》，申斥反动派“侵犯人民的自由，比较个人侵犯他人的自由，罪情更见严重……我们决不肯说‘予欲无言’，我们要呼喊，记住这个恨”。在我的脑海里，圣陶先生的形象愈战愈强，从写《文心》、《稻草人》、《倪焕之》的作家，一跃而为一位勇敢的民主战士了。

圣陶先生从事的工作是教育，是出版，他的工作态度一直是认真不苟的。他既全神贯注于事业，又善于在生活中寻找自己的休息方式。1952年以后，我在上海福州路一个出版单位工作，时常可看到圣陶先生的踪影，大约总是在下午五点钟左右，他从开明书店下班出来，偕同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等几位同事，在福州路上高长兴酒店小酌，喝的是绍兴黄酒，佐酒的无非是几碟发芽豆和豆腐干之类，饮尽后各自回家。饮几杯薄酒，只是生活中一种小小的乐趣，又如在人生的苦酒中寻找着一点淡淡的惬意，是休息芽是解闷芽也许还有一丝惆怅在酒意中袅袅地消散芽恐怕都未必是。我很欣羡这种恬淡而又洒脱的休息方式，我省悟着，这里最需要的是洒脱，而洒脱是人生中唯一的自主行为。

我与叶老的正式相识是在建国之后。此时我在出版社工作，他的夫人胡墨林女士也在那里，她的文字功底很好，工诗词，经常听到她当众吟诵。有时她因病或有急事不上班，叶老必托人带来请假信件给我，自此我与叶老渐渐相识，相熟，以至有时相见晤谈了。我那时才三十来岁，看来他天然有着“人生交契无老少”的宽厚的气质，他不嫌弃我，不用说，我益发敬重他。

叶老秉性诚笃，但对骄横专断的人，他非但不屑一顾，

而且极为鄙视。他的工作部门有个骄横者，动辄盛气凌人，但谁也不想碰他。我听说叶老有一次对他有些撞击，又一次我听到叶老的讲话中，对这类行为隐隐有所指责，虽未指名，听者都是明白的。由此我又领略了叶老是非分明的刚正性格。

然而这刚正性格的叶老却撞上了“文革”的大气候。那时他在教育部工作，“文革”风暴一起，他“靠边”了。使他困惑不解和气愤难平的事，是造反派竟贴出了诬蔑他为“教育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祖师爷”的大字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还不够，而且是“祖师爷”，他只能瞠目以对，愤恚无已。他一生刚正，哪件事都经得起检验，如今戴上大帽子，不容申说，只能等待着被揪斗。他自然明白，这无可理喻的事，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打倒一切罢了。不久后他又碰上一股黑旋风，他参加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忽一日被一批红卫兵进驻，一场冲击之后，扬言要对这“资产阶级”组织彻底砸烂，勒令民进会的人员停止工作，临走时将所有公用印章和文件悉数掠去。对已经饱受打击的叶老说来，这样的事已不足为怪。不过几经折腾，终于还是弄得他生了一场大病。

“文革”中，他就这样在孤寂、忧愤中度过。有一天，刚从干校回来的吕叔湘先生悄悄地来看他，寒暄后，叶老立即睁大了眼睛问他，“你是什么罪名呀”吕说，“反动学术权威加走资派，双料打倒对象。”叶老听罢黯然，半晌说不出话来。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倏忽间成了敌对分子，世事异化如此，真使他无话可说。

然而长夜总有黎明时，“四人帮”倒台了，这时候叶老方笑出声来，他那时写的诗词中有“算年来欢畅，无如斯时”之句，可知他心胸已见宽泰。1980年代初，我与友人去问

候他，他谈笑如初，述及往事，又不胜唏嘘。而他的刚正之心依旧，对不入眼之事，辄义愤填膺，旋即忧思交加。此后我又在他的次子叶至诚于 1985 年写的文章中看到，暮年时的叶老，对种种邪门歪道的丑闻，益发有切齿之恨。文中谈到他向叶老说起一些不正之风时，“父亲显得极为忧虑和愤慨，我只怕父亲过于动感情，夜里会失眠，劝他说，爹爹，不要动气。辛弃疾写过‘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父亲没听明白，问‘什么’，哥哥替我补了一句：‘笑人间万事’。父亲板起面孔对我说：‘我笑不出来选’我读后心中顿时涌现叶老刚正和凛然的形象，记起少年时读他的《文心》，书中对腐朽的败类骂过的一句话：“要他们做什么用选”

宁静的俞平伯

我对俞平伯气质中之宁静的最初的朦胧印象，是在年轻时读了他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后获致的。他和朱自清以同一题目各写了一篇散文，朱自清的那篇文笔流丽，写河流、灯影、笙歌、月色，笔下一片烟水空流，吐气如兰。而俞平伯之文另有造诣，他在听桨声中，时时耽于飞驰中的神思，内中有一注宁静之气，纤徐地展现着怪异的想象：“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这么淡，那么淡的浅笑。淡到已不可说，已不可拟，且已不可想；但我们终究是眩晕在它离合的神光之下的。”我每读至此，就感到如梦一般的迷离惆怅，他的散文透出的气息如一片轻盈的白云，呈现的是飘逸和迷惘、淡泊和宁静的情致。

然而到了五十年代，这宁静却碰撞到另一个境域，是在他的《红楼梦研究》被批判之时。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但是也有一种扼腕之感骤上心头。记不得在一次什么聚会上我见到他了，矮矮的身材，一脸平静，因为隔着好几个座位，我无法接近他。我频频地端视着他的神态，他安详、无言，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我听到别人说，平老对这场批判没有表示过什么意见，一以宁静对之。我又听到何其芳对那时的“不要对资产阶级投降”的警告很有些不以为然。我也觉得，对学术研究本来用不着随便去套上什么阶

级的帽子，我以为何其芳的看法和态度是豁达的。然而平老却更为豁达，豁达到无言，使我想到了沉默是最大的轻蔑这句名言。平老是否有此心意，我不敢说，以后我熟识了他之后也从未问过他，因他的沉默，却使我对他产生一种肃然之感。

“文革”中，他被冲击是无法避免的。批斗会、大字报连续地对他发动攻击，他依然宁静。我想，他的内心只怕也是忐忑不安的罢。他家住老君堂，每天必须到建国门学部去报到。由于他体质衰弱，需雇三轮车前往。我那时在单位中也是个主要的批斗对象，在尚未弄起“牛棚”前，每天“走读”。当我经过总布胡同时，常看到平老坐着三轮车在那里下车。有一次我看看四周无熟人，就过去同他打招呼，问候他的近况。他摇摇头，只说每天必须到学部报到，干一些活，接受审查。我问他，去学部还有一段路，缘何在这里下车？他说走几步罢。我由此恍然，他虽因走不动路而坐车，但是却不敢在学部门前下车，倘被革命群众发现，必是轻则一番斥骂，重则给以批斗。我看他步履蹒跚地向前走，很吃力的样子，他还要更吃力地去承受一次次残酷而漫长的批斗。

他第一次被揪斗时，一帮人呼啸而上，大叫谁是俞平伯，几个人将他揪出，打翻在地，大声喝问：“《红楼梦》是你写的，你是怎样用《红楼梦》反对毛主席的？”这些无知之徒，竟把《红楼梦》的作者说成是俞平伯。他们要他老实交代，平老耳背，听不清楚，回答时语不成声，揪斗者于是大呼“打倒”、“低头认罪”之类的口号，接着索性动手将他来回推搡，经踢打折磨之后，要他承认是“反动学术权威”。平老一口承认反动，因为不反动是不会来揪他的，反动是坐实了的。至于“学术权威”，他矢口否认，只是回答我不是权

威,我不够格。然而他的谦虚成了“顽固不化”的罪名,一顿拳脚又将他打翻在地。此时他已 76 岁。

“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是“文革”中的新罪名,是敌我矛盾,是批斗重点。前者之称为反动,意思是知识愈多愈反动,多到成了权威,那就是极端反动,也就是人民的敌人。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审查结论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受群众监督。翦老因此悲愤欲绝,自缢而亡。我想,平老矢口否认他是权威,看来不为无因,他是决不承认自己是敌人的。

我与平老逐渐接近起来,是在 1978 年我到了文学研究所工作之后,那时他已年近八旬。他已于老君堂迁至三里河居住。我每次去看他,他总是独处于斗室中,然后由他的子女搀扶出来。客厅中有一张方桌,他扶着桌边过来徐徐坐下。有时天气较冷,他仍习惯于赤脚穿着布鞋。每次寒暄之后,他说话不多,对于往事,几乎不想说,谈的多半是单位中的情况。我每次问他生活起居情形,他总是连声说“好的好的”。和我先前的感觉一样,他的心情一如既往地那样平静。

不几年,他的夫人亡故,他更是缄默不语了。他和夫人的感情极深,分手难舍,那缄默自然是表现着难舍和内在的悲痛之情。但他的体质和气色却并无什么两样,只是更加缄默而已。

如今他真的走向永远的宁静了。他的宁静,可以看作是对人生的一种回答,他不过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读书人和学者罢了,只是他后半生的颠簸,使得他的内心难以平静。我总觉得,他的宁静与缄默,似乎蕴藏着对人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悲怆与不平,如同宁静的大地底层运行着不熄的地火一样。他早年写《燕知草》,在自序中说过:“回首生

平 ,亦是‘洞然’而已。”早年的领悟 ,似乎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谶语。他的晚年 ,仿佛置身于大化中 ,不喜不惧 ,宁静而寻索无已。至于他一生挥洒的文学成就的光辉 ,无疑将永远映照在人们的心目中。